

香山、买办、华侨、革命：	
商人李耀祥与20世纪中叶的香港 / 梁元生	156
关系的伸缩与利害：何东买办家族的例子 / 郑宏泰 黄绍伦	165
陈炳谦与近代上海社会 / 宋钻友	194
亲情至上：晚清买办徐润的家庭生活 / 刘正刚	210
香山买办盛世丰及其家族史事与遗存考述 / 张建军	228
香山买办与上海广肇公所的重建 / 楚秀红	253
近代香山买办的乡、族观念	
——以《徐愚斋自叙年谱》为中心 / 漆德江 黄健敏	266
论近代通人郑观应 / 熊月之	285
评郑观应的“商战”思想 / 萧致治	296
郑观应“商战”思想再认识 / 周湖源	304
旧交 兰谊 道侣	
——郑观应张弼士交往史料据揅 / 李吉奎	308
东南互保时期的郑观应 / 马 勇	321
郑观应与王韬铁路认识之比较	
——以《盛世危言》、《漫游随录》为线索 / 邵 建	334
宪政的中国语境	
——郑观应“宪法”思想平议 / 何邦武	342
买办：中国近代化的先驱	
——以郑观应为中心 / 王学进	354
浅论郑观应的职业变化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	
——社会变迁中的角色变动视角 / 申群喜 梁文生	368
新地志和乡土地理中的民国中山	
——澳门经济关系 / 赵立彬	375
晚清德语文献中的澳门与香山 / 王维江	390
《英语集全》所反映广东（香山）人在洋务活动中的角色及与洋人的关系 / 李 宁	398
香山百货商人与民国时期上海城市文化及居民生活方式的形成	
——以“四大公司”为例 / 葛 涛	411
中国大陆买办研究60年的回顾与思考 / 江中孝	421
香山买办研究综述 / 陈国庆	424

香山、买办、华侨、革命： 商人李耀祥与20世纪中叶的香港

梁元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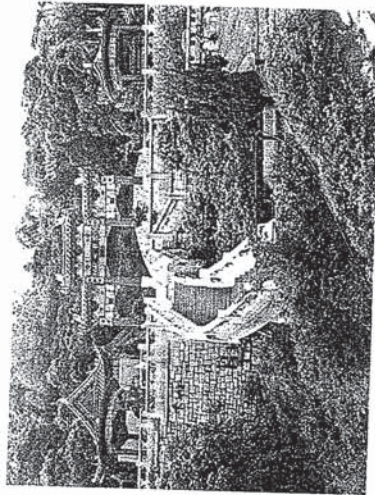
一、引言

本文以20世纪中期香港商业巨子、社会企业家、小区领袖——李耀祥 (Lee Ju-cheung) 为研究对象。尽管他富有，具有很高的社会声望，却很少有商业史的学者或香港史专家对他进行论述。而“李耀祥”这个名字的重新提出，及人们对李氏家族了解的渴望，主要是随着公众对李氏家族产业——龙圃 (Long Pu) 的变卖及对其发展的讨论而渐渐引起关注。

龙圃于1948年由香港著名建筑师朱斌建造，占地50万平方英尺。2006年春天，位于新界深井青龙头 (Tsing Lung Tau) 的龙圃大宅最初传闻将被售予一地产发展商，拆除后地产商将会在此地建筑新的高层公寓。此举遭到龙圃主人李耀祥孙女——李康意的反对。她积极奔走，力图保存这座古老的园圃和建筑，她的努力获得叔叔李韶博士 (即李耀祥的小儿子) 的支持：以1亿3千万港币，买下其他家族成员对该产业的占有份额，阻止了发展商的收购。在获得龙圃的全部所有权后，李韶博士及夫人李梅以晋博士，宣布会将宅院捐献给香港政府，并且期望政府承诺会保存、修复宅院，将其作为历史遗迹和公众教育的场所。

事情的戏剧性转折，李氏家族的内部纷争，以及李韶夫妇的慷慨义举都燃起了大众对李氏宅院和李耀祥本人历史的兴趣。本文关注的对象并非龙圃本身，而是其背后的主人——李耀祥。以下，我们将会探究李氏家族在广东的背景，追溯其在香港发展致富的过程，重点分析李耀祥在20世纪中叶香港社会发展、小区建设中发挥的作用，尤其在战后时期城市转型中的作用。

香山、买办、华侨、革命：商人李耀祥与20世纪中叶的香港



龙圃大宅

二、香山李氏——移民、商业与革命

李氏家族来自中国广东香山。像华南其他有名望的家族一样，李氏家族的祖先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的中原地区。但从现存的文字记载，我们可知在2000年以前，李氏族人已经在广东省中山县小榄镇定居。

中山，古称香山，是广州南部珠江三角洲“四邑”之一，其他三个地区分别为番禺、南海及顺德，中山素以移民及其海外的联系、当地居民的经商意识和广泛的商业网络而闻名。此外，他们与近代中国历史上的革命运动也紧密相连。事实上，中山人身上的三种特性：移民、经商意识和革命联系，都与李氏家族的历史紧紧缠绕在一起。

中山和毗邻的五邑地区 (即台山、开平、恩平、鹤山、新会) 自16、17世纪始已成为侨民出国之乡。尽管来自福建省和广东省一些地方如潮州、汕头、嘉应以及惠州的大多数侨民已经移居到东南亚 (俗称南洋)，但是大多数来自中山和五邑的侨民选择东行至北美，或南下至澳洲。因此，中山和五邑居民与加拿大、美国 and 澳大利亚等国建立了紧密持久的海外联系。

从中山移民到美国的知名家族和个人有：旧金山的唐氏家族，家庭成员包含唐嘉祿、唐茂枝、著名的唐廷枢 (唐景星)，以及在夏威夷的陈芳、陈

滚、程利、唐雄等。^[1]移民到澳洲的有：香港和上海四大公司的创始人——永安的郭氏家族（郭泉、郭乐）、先施的马氏家族（马应彪）、上海新新的李氏家族（李敏周）和刘氏家族（刘锡基），以及香港大新的蔡氏家族（蔡兴、蔡昌），都是从中山移民到澳洲的早期移民。

很多早期移民因为经济因素移居海外。例如，19世纪中期，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就有很多工作机会，如采集金矿和修建铁路等。稍后移居海外的人，大多数为了与在那里做生意的家人团聚。许多从中山县出来寻找工作的人，侨民来到加利福尼亚或墨尔本修铁路，或当矿工。后来，他们当中有很多在那里定居，并开始经营自己的生意，比如洗衣店、餐馆、理发店以及一些他的小生意。^[2]

很多中山人在出国之前并不富裕，但是后来大部分人事业有成，积累了可观的财富，无论是在他们的居住地，还是广东南部的家乡，他们的身份地位都有了提升。根据黎志刚对二百年来中山商人及其网络的研究，总体来说，大多数的中山侨民具有冒险进取的精神，工作勤奋，有精明的经商手法并希望建立自己的商业网络。^[3]他们不仅不远万里离家寻找贸易机会，而且几乎在中国的各个省份都建立了商业基地。

在近代，中山走出了大量著名商人，他们都具有上述的品质和经历。这些人包括：上海棉纺厂和一些中国近代企业的创始人郑观应、20世纪早期在香港和上海先施公司的创始人马应彪和永安公司的建立者郭氏兄弟（郭泉、郭乐）。这些中山的商人和企业家都是早期到澳洲和东南亚的移民。^[4]

我们想要指出的是：移民、从商习性和商业网络，是了解中山历史的重要层面，同时也是掌握李氏家族在广东的背景、分析其在香港和华南商业圈中崛起兴业的重要角度。

[1] 黎志刚：《近代广东香山商人的商业网络》，转引自王远明主编：《香山文化——历史投影与现实镜像》，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3—114页。

[2] 早期华人移民美国的历史，可参麦礼谦著：《从华侨到华人——二十世纪美国华人社会发展史》，三联书店，1992年。

[3] 黎志刚：《近代广东香山商人的商业网络》，转引自王远明主编：《香山文化——历史投影与现实镜像》，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109—121页。

[4] 关于中山商人的特性，参胡波：《近代中西文化碰撞中的香山买办》，王远明主编：《香山文化——历史投影与现实镜像》，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8—90页。

中山历史的第三个层面是它在中国近代革命运动中的角色。在19世纪中期，许多中山人，与临近地区的客家人、广东人一起，卷入了太平天国运动的中心。19世纪末20世纪初，他们当中的大部分参与了中华民国的创始，亦即是中山人的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运动。

李耀祥的家族史印证了这三种因素的内在关联。他的祖父李仁荣，在中山以经营棚业著名，同时有亲友在中国其他城市和美国经商。李耀祥的叔祖父李英带，在太平天国叛乱时期是当地民众的领导人，名声鹤立。后来，成为当地反清革命运动的领导人。因此，他的反清运动导致了清政府对他的迫害，也致使李家族人由广东移居香港。我们不知道李英带对李耀祥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但是这个革命英雄对这个家族的影响，在第二代和第三代的子孙身上得到了生动的体现。其影响之深，以至幼年的李耀祥在香港成长时，十几岁的梦想就是成为革命领袖。1910年，年甫十四岁的李耀祥只身离家，投身到广东的革命浪潮中。

三、香港兴业——李培基、李耀祥与李耀记

承前所述，李耀祥在20世纪初来到香港。他的父亲和族内的其他成员为了躲避由李英带反清运动的失败导致的清政府的迫害，纷纷逃离中国。据记载，“在弟弟（李英带）失败之后，祖父李仁荣认为有必要寻求庇护，因此携全家人避居香港，在殖民地的香港定居。”^[1]在移居香港的头几年，李仁荣和他的妻子刘宽（即李耀祥的祖母），住在九龙的油麻地。他们努力工作，逐渐积累了一些财富，并且投资地产，成为油麻地区发展的领军人物，在油麻地发展成为集市、市场、商店、街铺的商业区及住宅区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李仁荣有三个儿子，小儿子名叫李培基（即李耀祥的父亲），习建筑师，于1896年创立了李基号，主营建筑材料。^[2]李基号规模的不断发展壮大，为李耀祥的商业帝国的建立奠定了有力的基础。

[1] 岑维休：《李耀祥先生事略》（A Brief Biography of Lee Lu Chiening），1967年自印本，第2页。

[2] 岑维休：《李耀祥先生事略》（A Brief Biography of Lee Lu Chiening），1967年自印本，第2页。

李耀祥的个人历史贯穿了香港自1900年至20世纪70年代的发展历程。他生于1896年，与李基号成立年份相同。1905年李家搬至香港岛的上环，他开始于育才书社（Ellis Kadoorie School）读小学，而李基号也坐落于此。

李耀祥少年时在香港还有一段趣事。据说这位少年深受孙中山革命理念的影响。1910年，14岁的他离开家，离开学校，来到广东西部的新兴县，参加反清运动。攻克县城时，他是领队入城的第一人。然而，在他参加北伐战争之前，父亲命他回到香港育才书社继续学习。因学习勤奋，在1911年通过了牛津初级教育考试，并获得卢押奖学金。1913年考入香港大学，主修土木工程。^[1]他在香港大学所学的工程专业和美国对于此领域的深造，可帮助我们了解中国工程专业人士的发展及他们在社会转型中所担任的角色。

为什么选工程专业？在李耀祥的时代，工程并非一个热门的专业。工程系在港大刚刚建立，社会上也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个系。李耀祥的选择，一定程度上受到李氏家族建材生意的影响，他想学习更多与机械和土木工程相关的知识。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据笔者推测，是他想要将技术和水利工程应用到中国的治洪当中。据说他在中国南部的这段时间里，经历了几次带来巨大伤亡和惨重损失的洪灾。换句话说，李耀祥决心学习“新知识”，以“帮助中国”及“挽救中国”，这也是当时到国外深造的五四知识分子的普遍理念。李耀祥在港大的老师威廉姆布朗（William Brown）教授指出，用科学知识和技术来武装中国的理念是真实可感的。对于李耀祥的赴美深造，他指出：“李耀祥现在赴美专攻河流管理和利用，一心想要开发祖国的资源。”^[2]1917年李耀祥于港大毕业后，即赴美国康奈尔大学继续深造“水利工程”。

然而，李耀祥在美的求学历程因父亲的去世而突然中断。1920年3月，父亲病重去世，他从康奈尔大学退学，回到香港家中。他很快在母校找到了一份兼职的教书工作，并把大部分的时间放在管理父亲创立的商业——李基

[1] 岑维休：《李耀祥先生事略》（A Brief Biography of Lee Lu Cheung），1967年自印本，第3页。

[2] W. Brown, "Testimony in favour of Mr. Lee Lu Cheung, B.Sc." dated 21st March, 1919 (李韶博士证本)

有限责任公司，开始了迈向社会特权和领导阶层的征程。

李耀祥在香港经营多种产业，参与很多慈善事业，尽管这一点经常被外界忽略，但这对于香港的社会和经济史，却是极其重要的一章。在接手李基号之后，他将公司名字改为李耀记有限公司，发展成为香港的大建材公司之一，在李耀祥快速壮大的商业帝国中居于旗舰和主导地位。李耀祥创办的大量商号（见下表）。

李耀祥创办的商号

1. 李耀记建筑用品行	2. 耀兴洋纸行
3. 耀中机械厂	4. 耀昌出入口行（广州）
5. 耀华运输公司	6. 耀民染纸厂
7. 世界洋行出入口行（香港）	8. 世界置业有限公司（投资）
9. 耀中置业有限公司（物业）	10. 青龙置业有限公司（地产）
11. 景星电影院	12. 大丰工业原料有限公司
13. 新乐风有限公司（唱片）	14. 香港娱乐有限公司
15. 高升戏院（舞台剧）	16. 西院（电影院）
17. 世界洋行有限公司	18. 世界职业业有限公司
19. 安乐汽水有限公司 ^[1]	

李耀祥自己参与一些公司的管理，出任董事局主席的有：李耀记有限公司、裕泰针织有限公司、裕南纱业有限公司、青龙置业有限公司、耀中置业有限公司。^[2]

任董事的有：华侨日报、麒麟有限公司（船务）、浅水湾兴业有限公司。

任董事局副主席的有：香港平民屋宇有限公司。

在20世纪30年代，李耀祥成为华商总会的活跃分子，在1930年出任华商总会会董。^[3]然而，李耀祥商业网络的大规模扩张，主要是在太平洋战争之后。20世纪40年代初期，日本侵占香港，给香港社会、经济和民生造成了巨

[1] 岑维休：《李耀祥先生事略》（A Brief Biography of Lee Lu Cheung），1967年自印本，第4—6页。

[2] 岑维休：《李耀祥先生事略》（A Brief Biography of Lee Lu Cheung），1967年自印本，第4—6页。

[3] 岑维休：《李耀祥先生事略》（A Brief Biography of Lee Lu Cheung），1967年自印本，第17页。

大的损失。城市中很多建筑因轰炸和空袭而被毁，一些是在日军搜索敌人的过程中被拆除。贸易和制造业受阻，货币问题令商人和普通市民感到恐慌。但最大的还是住房和失去住所民众的重新安置问题。战后，住房问题变得更加紧迫，那时由于国共两党之间内战，内地大量难民涌入香港。而李耀祥的商业圈，以李耀记有限公司为主，主要是提供建材和承包建筑项目。战后的建筑热潮给李耀记提供了一个“重建香港”的黄金机会和重要角色。因为李耀祥与殖民地政府以及华人社会所建立起的的良好关系，他的公司接到香港政府的大量建筑订单，他本人也成为香港重建运动中至关重要的人物。

四、回馈社会——李耀祥的社会工作

尽管李耀祥的受教育经历及其学识本身是一项有吸引力的研究，但是他人生的其他方面，譬如他的商业生涯，在香港政治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的作用，及其参与的慈善事业，都能够从某种角度帮助我们了解香港在二战后如何从英国殖民地转型为一个活跃的工商业城市。李耀祥参与战后香港的建设，重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李耀祥参与了香港工业和经济的转型。这点从李氏家族管道设备生意和建材生意的扩张中，在造纸和机械、纺织和航运、贸易和投资等新领域的开拓中可以看出，当然还有房地产和土地开发等领域。

其次，他参与政府委员会，并且管理华人最大的慈善机构——香港的东华医院。他帮助改善医院的管理文化和财政预算，使东华成为香港慈善机构管理的典范。李耀祥在1926年和1927年被选为广华医院总理，1928年出任东华医院总理，次年任保良局总理。这标志着李耀祥对公共事务的兴趣逐步增加，他将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社会工作，这些事业成为他后半生主要的关注点。1940年他当选为东华三院董事会主席，同时亲身参与多个委员会，特别是医务委员会，以这种方式，推动和促进各委员会的管理和财务调控。

最后一个领域是他在当地政府和小区组织中担任的角色，尤其是香港团防局、香港政府华人咨询委员会、九龙城街坊福利会。通过这些组织，政府和小区建立起密切的合作关系和咨询机制，此后发展成区委员会，在战后

的香港领导了多次改革，包括20世纪50年代的难民安置问题。20世纪40年代初，战争刚刚结束，李耀祥在香港政府难民营委员会和香港重建委员会工作。20世纪50年代，难民问题是香港最为严峻的问题之一。虽然政府和宗教团体和教会等非政府组织，为民众提供救济和社会服务，但是没有人能够解决住房问题。政府是否应该为难民提供住房补贴呢？立法委员会的委员们，以Lo Man-kan先生为首，反对政府干预。^[1]在这一点上，李耀祥走出来并建立一个非营利组织——香港平民屋宇有限公司来建设安置住房。此组织成立于1952年，李耀祥任副主席，负责实际的行政管理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香港平民屋宇有限公司投资了几十亿港币，为难民建造了大约一千五百座七至九层高的廉价住宅。鉴于他的贡献，英国政府在1952年授予他大英帝国优等勋衔。在1953年石硤尾大火之后，香港政府更被迫采取行动为日益增多的人口，不仅仅是难民，提供住房资助。^[2]

战后，李耀祥活跃于九龙城街坊福利会。九龙城靠近难民居住地调景岭和钻石山，是一个贫苦的地方。李在当地建立了医疗诊所——李基纪念医局，为孩子们建立了免费学校。他个人捐献了建立医疗诊所一半的费用，另一半来自香港政府。1956年筹建九龙城街坊福利会议校，出任学校董事会主席，在之后几年中，为学校的运作筹集资金。^[3]

五、余论

本文试图将李耀祥放入近代中国历史和香港社会转型的背景之下，来重述他的生平。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现将李耀祥作为一个商人、慈善家或者小区领导人而进行研究学术著作。唯一记录他生平的一份双语的小册子，题为《李耀祥先生事略》，由他的朋友、华侨日报的创办人和总经理岑维休撰

[1] David Faure,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Hong Kong Society*, Hong Kong: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249

[2] 岑维休：《李耀祥先生事略》（A Brief Biography of Lee In Cheung），1967年自印本，第19页。

[3] David Faure, *Ibid.*, p. 251

[4] 岑维休：《李耀祥先生事略》（A Brief Biography of Lee In Cheung），1967年自印本，第5—6页。

于1968年。首先，本文试图将李耀祥及其商业的勃兴与中山的背景相联系，强调了地理文化特质赋予中山商人商业扩张的有利条件。其次，本文关注李耀祥的个人经历，及其早期与中国革命的联系。他在香港接受的双语专业教育，家族企业与香港经济的密切联系，以及这些是如何助成李耀祥的成功。第三，着重强调李耀祥在太平洋战争后香港重建中的多重身份——英殖民政府的合作伙伴、小区领导人、社会企业家。关于李耀祥作为慈善家和医疗改革家的研究，笔者将另文论述。

(作者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讲座教授、系主任)

关系的伸缩与利害：何东买办家族的例子¹¹

郑宏泰 黄绍伦

引言

作为19、20世纪游走于中西种族之间，负起洽谈贸易、交流文化甚至是传播宗教、思想与艺术的中间人或代理人，买办的角色可谓极为吃重。受历史及政治等因素的左右，在过去的一段时间，社会对买办阶层的看法颇为负面，什么“洋奴”、“帝国主义走狗”或是“阶级敌人”等，成为扣在买办头上的不同帽子，令他们背负了不少历史恶名。时移势易，随着社会的不开放，加上冷战思维及意识形态的逐渐淡化，学术界较能摆脱过往的樊篱，在重视科学实证、讲求客观中立的治学风气下展开研究，而近年出现的各种深具独特角度的分析，更是令人耳目一新。除了传统的政治、经济及商业角度分析，更有从文化地理入手，亦有从日常生活，或是从个人传记或口述历史层面入手等等，令人对买办的遭遇及买办的角色有更为全面深刻的认识。

虽然近年有关买办的研究百花齐放，取得了不少突破，但我们却注意到某些地方仍然有待进一步探讨，在发挖史料及分析数据时仍面对着不少问题。举例说，我们一直笼统地将买办看作一个统一而和谐的阶层或群体，忽略了当中的复杂性、多元性、矛盾性和差异性，因而甚少触及不同买办间的明争暗斗，对于买办参与政治而拉扯出来的所谓政商利益输送问题，亦说得不够具体透彻，本文则希望从这方面入手，以香港欧亚混血的何东买办家族为例，谈谈不同买办阶层的亦政亦商，以及彼此间的口和心不和或暗中较劲

¹¹ 本文所引用的资料，来自“Entrepreneurial Families: The Rong, Gu and Ho Tung Business Dynasties”及“Negotiating Identities: A Comparative Studies of Three Generations Eurasian Women in Hong Kong”的研究项目，经费来自大学研究资助局 (HKU 7468/05H) 及香港大学 (Project Ref. No. 200907176199)。谨此致谢。研究过程中，陈艺彬先生及袁咏琪小姐曾给予很大的帮助及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